# 友爱社区

播报编辑[讨论](https://baike.baidu.com/planet/talk?lemmaId=62376367&fromModule=lemma_right-issue-btn"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上传视频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银古路街道下辖社区

展开2个同名词条

友爱社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银古路街道，地处银横公路丽景南街向东500米处，邻近隆鑫苑、G109国道等交通节点 [2] [4]。该社区作为基层政务公开单元，2021年在顺发小区设置政府信息查阅点 [1]，2007年获评银川市四星级社区称号 [3]。辖区公共交通网络发达，覆盖10余条公交线路，配套大团结广场等公共设施 [2] [4]。社区持续开展基层治理实践，包括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及冬至包饺子等群众活动 [6-7]。

## 社区建设

播报

编辑

### 政务公开服务

2021年12月，社区在清和南街昆仑市场西门顺发小区15#面南1-2层设立政府信息查阅点，配备政策文件查阅终端与纸质档案柜，提供低保申请、计划生育等12类政务事项的公示服务。该站点作为兴庆区首批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试点，日均接待居民咨询30人次 [1]。

### 星级社区创建

2007年银川市开展社区星级评定工作，友爱社区以基层党建、环境治理、公共安全三项指标得分率92%的成绩入选四星级社区名录，成为银古路街道首批获此荣誉的基层单位。评定结果通过社区服务站硬件改造、网格化管理体系优化等措施巩固提升 [3]。

### 基层治理实践

2019年12月，社区被纳入银古路街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设立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的社会工作室，开展重点人群心理疏导年均150人次 [7]。根据街道领导班子2025年工作分工调整方案，党工委委员郝凯定点包抓社区综合治理事务，指导完成社区戒毒人员帮扶等专项工作 [8]。

2024年12月，社区联合辖区商户举办"冬至暖意浓 水饺话团圆"活动，组织近百名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参与，现场提供粉汤水饺、八宝茶等餐饮服务。此次活动系社区"四季关爱"系列行动的组成部分，累计惠及居民超过500人次 [6]。

# 友谊

*首次发布于 200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实质性修订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

此处所理解的友谊，是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其根基在于朋友之间对彼此福祉和利益的关心，并包含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因此，友谊无疑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我们对朋友的特殊关心必须在更广泛的关怀（包括道德关怀）中占有一席之地；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朋友能够帮助我们塑造人格。鉴于友谊的这种中心地位，一些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友谊的正当性；在此背景下，当有新朋友出现时，是否可以“交换”友谊；以及在友谊的要求与道德的要求似乎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能否协调两者。

* [1.友谊的本质](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NatuFrie)
  + [1.1 互相关怀](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MutuCari)
  + [1.2 亲密关系](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ti)
  + [1.3 共享活动](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SharActi)
* [2.友谊的价值与理由](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ValuJustFrie)
  + [2.1 个体价值](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diValu)
  + [2.2 社会价值](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SociValu)
* [3.友谊与道德理论](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FrieMoraTheo)
* [参考书目](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Bib)
* [学术工具](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Aca)
* [其他互联网资源](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Oth)
* [相关条目](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Rel)

## 1.友谊的本质

友谊本质上包含着对朋友的一种独特的关心，这种关心可以合理地理解为一种爱。然而，重要的是不要误解友谊所包含的爱。古希腊语中有三个词可以合理地翻译为爱：*agape*、*eros*和 *philia*。其中，*agape*在基督教传统中表示一种爱，这种爱不回应对象的先前价值，而是被认为在对象中创造价值，就像上帝对我们人的爱，以及引申开来，我们对上帝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一样。相比之下，*eros*和*philia*通常被理解为回应对象的优点——爱人的特性，比如他的善良或美丽。区别在于，*“eros”*指的是对某个对象的强烈渴望，通常与性有关；而“ *philia* ”最初指的是一种深情的关怀或友好情感，这种关怀或友好不仅针对朋友，也可能针对家人、商业伙伴，甚至整个国家（Liddell 等，1940；Cooper，1977a）。鉴于这种对爱的分类，*“philia”*似乎与友谊最为相关（尽管 *“philia”*究竟是什么，仍有待更详细地阐明）。

因此，爱情和友谊常常被混为一谈；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按照这里所理解的，爱是一种针对特定人本身的*评价态度* ，无论这份爱是否得到回应，也无论我们是否与她建立了关系，我们都会对她采取这种态度。[ [1](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1) ] 相比之下，友谊本质上是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植根于双方对彼此的特殊关心；尽管我们必须为单恋的概念留出空间，但单恋的友谊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友谊的解释往往不仅仅将其理解为某种形式的互爱（以及对这种爱的相互承认），而且本质上涉及朋友之间的重要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友谊是一种特定的关系。

尽管如此，仍有疑问：究竟如何区分植根于*爱欲（eros）*的浪漫关系和植根于友爱*（philia）*的友谊关系？因为两者都涉及当事人之间重要的互动，这种互动源于一种对自身价值做出回应的互惠之爱。显然，两者的区别在于，浪漫爱情通常包含一种友谊所缺乏的性投入；然而，正如托马斯（1989）所问，这足以解释它们之间的真正差异吗？巴德瓦尔（Badhwar，2003，65–66）似乎如此认为，他认为性投入融入浪漫爱情的部分原因在于对肉体结合的激情和渴望，而友谊则包含着对更心理层面认同的渴望。然而，我们尚不清楚如何理解这一点：究竟什么样的“心理认同”或亲密关系是友谊的特征？（更多讨论，请参阅 [第1.2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ti)。）

在关于友谊的哲学讨论中，人们通常会遵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的教导，将友谊分为三种：快乐之友、效用之友和美德之友。虽然如何理解这些区别尚不明确，但基本思想似乎是，快乐、效用和美德是我们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中爱朋友的原因。也就是说，我爱我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从她身上获得了快乐，​​或者因为她对我有用，或者因为我发现她品德高尚。考虑到每种情况下都包含爱，这三种友谊似乎都涉及对朋友的关心，而不是为了你自己。

这里，友谊的本质在于关心朋友，而快乐与功利友谊的理念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矛盾：如果你关心朋友仅仅是因为从中获得快乐或功利，又怎么能真正关心他呢？如果你帮助朋友，最终是因为你得到了好处，那么你似乎并没有真正地为了朋友而爱他，你们的关系终究算不上真正的友谊。因此，快乐与功利友谊充其量只是一种有缺陷的友谊模式；相比之下，美德友谊，由于其动机是朋友品格上的优秀，是真正的、无缺陷的友谊。因此，大多数当代研究都关注无缺陷的友谊形式，而忽略了快乐与功利友谊。[ [2](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2) ]

正如本节第一段所述，*philia* 似乎是对他人的关心，与友谊最为相关，而“ *philia* ”一词有时也被翻译为友谊；然而，*philia*在某些方面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友谊有着重要的区别。 因此，“ *philia* ”不仅适用于朋友，还适用于家庭成员、商业伙伴以及整个国家。当代对友谊的论述对家庭成员，特别是成年之前的孩子，是否可以成为朋友存在分歧。大多数哲学家认为不能，他们认为友谊本质上是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一些哲学家（如 Friedman 1989；Rorty 1986/1993；Badhwar 1987）明确地希望他们的友谊论述包括亲子关系，这可能是受到历史概念 *philia*的影响。尽管如此，父母之爱及其产生的关系与朋友之爱及其产生的关系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里的重点将放在更狭义的友谊上。

在关于友谊的哲学论述中，有几个主题反复出现，尽管不同的论述对这些主题的表述有所不同。这些主题包括：相互关怀（或爱）、亲密关系和共同活动；我们将依次探讨这些主题。

### 1.1 互相关怀

几乎所有观点（Telfer 1970-71；Annas 1988、1977；Annis 1987；Badhwar 1987；Millgram 1987；Sherman 1987；Thomas 1987、1989、1993；Friedman 1993、1989；Whiting 1991；Hoffman 1997；Cocking & Kennett 1998；以及White 1999a、1999b、2001）都认为，友谊的必要条件是朋友之间彼此关心，并且为了对方的利益而关心；实际上，这意味着朋友之间必须彼此相爱。虽然许多关于友谊的论述并未进一步分析这种相互关心，但在那些进行深入分析的论述中，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友谊中所包含的这种关心，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为了朋友的利益而关心他人，既包括同情，也包括为朋友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朋友必须被朋友的遭遇所感动，才能产生相应的情感：为朋友的成功而欣喜，为朋友的失败而沮丧和失望（而不是对朋友本身感到失望），等等。此外，出于彼此关爱的某种表达，朋友之间通常必须倾向于为对方谋福利，而不是出于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然而，不同意见请参见 Velleman 1999。）

关心某事通常意味着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或有价值；关心朋友也不例外。关于相互关心的不同解释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这些解释对其中隐含的评价的理解方式不同。大多数解释认为评价是一种评价：我们关心朋友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身上具有优良品质（Annas 1977；Sherman 1987；Whiting 1991）；这与上文第一节第一段中对爱作为*友爱（philia）*或*情欲（eros）*的理解相符。因此，许多作者认为，与坏人交朋友会暴露出一种潜在的、应受道德谴责的评价缺陷（例如，参见Isserow 2018）。然而，其他解释则认为关心在某种程度上是赋予你所爱之人价值：在关心朋友时，我们因此将一种内在价值投射到他身上；这与上文对爱作为*博爱（agape）的理解相符。*

弗里德曼 (1989, 6) 主张给予，他说如果我们将友谊建立在对朋友优点的积极评价之上，“那么*我们*对此人的承诺就从属于我们对相关评价标准的承诺，而本质上并不是对此人的承诺。”然而，这样说未免操之过急，因为诉诸对朋友性格中优点的评价来证明你们的友谊，本身并不能使你们的友谊从属于该评价。相反，通过友谊，通过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你可能会改变你的评价观，从而实际上使你对某些价值观的承诺从属于你对朋友的承诺。当然，在友谊中，影响不必只朝一个方向发展：朋友之间会影响彼此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事实上，朋友之间会相互影响，这是许多人认为友谊中必不可少的平等关注的一部分，也是 [第 1.2 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ti)亲密关系讨论的核心。

（有关为了他人而关心他人的概念以及有关它的各种哲学解释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有关 [爱的](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ve/)条目。）

### 1.2 亲密关系

友谊与其他人际关系不同，即使是那些以相互关心为特征的关系，例如同事关系：友谊直观上是一种“更深层”、更*亲密的*关系。任何哲学阐释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友谊特有的亲密性。

关于这一点，文献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差异之大甚至引发了一个问题：不同的解释是否旨在阐明同一对象。因为，当对亲密关系的分析相对较弱时，其目的似乎在于阐明所谓的“熟人友谊”；而随着对亲密关系的分析越来越深入，其目的似乎倾向于更紧密的友谊，甚至趋向于一种极致亲密友谊的理想状态。或许有人会问，在分析中，是否应该优先考虑其中一种类型的友谊？例如，亲密友谊可以被理解为熟人友谊的增强版，或者熟人友谊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在各方面都与理想友谊存在缺陷。尽管如此，下文将大致按照对亲密关系的解释由弱到强的顺序来阐述这些观点。

首先，托马斯（1987；1989；1993；2013）认为，我们应该从相互自我表露的角度来理解这里所说的友谊的亲密性：我会告诉朋友们一些我做梦也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并且我希望他们能让我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托马斯认为，这种相互自我表露的意义在于建立友谊所必需的“信任纽带”，因为通过这种自我表露，我们既能向彼此敞开心扉，又能感受到对方对我们的善意。正是这种信任纽带奠定了友谊所特有的那种亲密关系。（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安妮斯（Annis）1987。）

Cocking & Kennett (1998) 将此讽刺为“秘密观点”，并指出：

同伴朋友之间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的纽带并非源于分享私人信息，甚至并非源于分享非常私密的信息。至多，朋友之间分享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518]

他们的观点是，秘密观低估了友谊中所指的信任，将其主要视为一种自由裁量权。鉴于友谊的本质在于双方为了对方的利益而关心对方的利益，并因此为对方的利益行事，建立并维持一段 友谊*关系*通常需要你对朋友对你整体的善意抱有相当大的信任，而不仅仅是对你的秘密的信任。此外，友谊通常也包含对朋友判断什么对你最有利的信任，因为当你的朋友看到​​你伤害自己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应该介入，而通过友谊，你可以依赖她这样做。（另见Alfano，2016，他强调不仅要信任，还要值得信赖，以此表达类似的观点。）

这种增强的信任可以促成“共同的兴趣、热情或观点……[或]相似的思维方式，从而产生高度的同理心”（Telfer 1970–71, 227）。Telfer 认为，这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是朋友之间“纽带感”的核心，类似于 White (2001) 所倡导的“团结”——分享价值观和对重要事物的认知——这是友谊的核心。因为，以这种方式信任朋友对我的评价，似乎不仅意味着相信她了解我是谁，*相信*我认为生活中某些事物有价值且重要，而且也意味着相信她理解这些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事物的*价值*。反过来，这似乎又植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同理心——对重要事物的共同认知。因此，Telfer 和 White 在诉诸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时，比 Thomas 和 Annis 更深刻地理解了友谊中至关重要的亲密关系。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共享”价值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样，价值观也有强弱之分。弱的价值观指的是，利益和价值观的契合是发展和维持友谊的必要条件；当这种美好的契合消散时，友谊也随之消散。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安纳斯对亚里士多德友谊观的总结（1988, 1）：

那么，朋友就是：（1）为了朋友的缘故，希望朋友做好事（或表面上做好事）；（2）为了朋友自己的缘故，希望朋友存在和生活；（3）花时间陪伴朋友；（4）和朋友做出同样的选择；（5）和朋友一样，觉得同样的事情愉快和痛苦。

（4）和（5）是当前论证中的重要论点：如果始终如一地与朋友做出相同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持有相似的看法。鉴于亚里士多德将快乐和痛苦理解为评价性的，并由此揭示了（表面上）善恶，（5）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其含义或许是，仅仅在评价性观点上巧合就足以满足（4）和（5）。

当然，亚里士多德（和安娜斯）会拒绝这种解读：朋友之间并非仅仅拥有友谊之前的相似性，而将其作为友谊的必要条件。相反，朋友之间可以影响和塑造彼此的评价视角，从而通过他们关系的动态发展，强化彼此的价值观。理解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朋友就像彼此的一面镜子：友谊建立在性格相似的基础上，而我对自己性格的直接了解并不完全准确，因此，通过认识一个能够反映我性格特质的朋友，我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包括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朋友之间细微的差异，例如我的朋友偶尔会做出我不会做的选择，会促使我反思这种差异是否暴露了我性格中需要改进的缺陷，从而强化了我和朋友评价视角的相似性。从镜像视角来看，我的朋友扮演着完全被动的角色：仅仅通过做他自己，他就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性格（参见 Badhwar 2003）。[ [3](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3) ]

Cocking & Kennett (1998) 从两个方面反驳了这种镜像观。首先，他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相似性作为友谊的激励和维系因素。朋友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在友谊中，朋友之间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但这应该被理解为友谊的*产物*，而非友谊的构成要素。其次，他们认为，用朋友作为镜子来解释日益增长的相似性，会将过多的被动性赋予朋友。他们认为，我们的朋友在塑造我们方面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而镜像观未能认识到这一点。（Cocking & Kennett 的观点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Lynch (2005) 进一步批评了镜像观，认为朋友之间的差异可能是他们友谊的核心和重要因素。）

米尔格拉姆（1987）对关于朋友是镜子（至少亚里士多德如此认为）的标准解释进行了有趣的解读，他声称，在镜像朋友的过程中，我对朋友拥有并维持其所拥有的美德负有因果责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朋友的“生育者”，因此，我在朋友身上实现了自我。米尔格拉姆认为，正因如此，我才会像爱自己一样爱我的朋友，这也解释了：(a) 亚里士多德关于朋友是“另一个自我”这一令人费解的说法；(b) 鉴于我仅仅是这个特定个体的生育者，为什么朋友是不可替代的；以及 (c) 为什么不涉及这种生育的快乐和功利友谊，就不能算作真正的友谊。 （更多关于可替代性问题的内容，参见 [2.1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diValu)。）然而，米尔格拉姆在提出这一解释时，似乎混淆了我对朋友美德的因果*必然性和我对这些美德的责任*——混淆了我作为镜子的被动角色与“生育者”的角色，后者看似主动的角色。因此，米尔格拉姆对镜像的理解也未能逃脱科金和肯尼特对镜像观的批评，他们认为镜像观赋予了朋友作为镜子过多的被动性。

弗里德曼（1989）提出了另一种理解朋友对我的价值观影响的方式，即运用“赠予”的概念。弗里德曼认为，友谊的亲密性体现为朋友之间作为独特个体所做出的承诺，这种承诺中，

朋友的成功令人欣喜；她的评判或许能引发反思，甚至令人敬佩；她的行为或许能激励他人效仿；她所倡导的事业或许能激发人们的忠诚……一个人对待朋友的方式是否得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目标、*抱负*、需求和*性格*——仅仅因为这些都是她自己的，一个人就会觉得值得去承认。[4]

[如第 1.1 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ti) 第 3 段所述 ，弗里德曼认为，我对朋友的承诺不能建立在对她的评价上，因此，我对她的目标等的价值的承认，在于我赋予这些目标价值：她的目的对我来说变得有价值，因此适合激励我的行为，“仅仅因为这些目的就是她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承诺包括认真对待我的朋友，这意味着发现她的价值观、兴趣、理由等为我提供了*相应的*理由，让我去重视和思考。[ [4](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4) ] 这样，友谊关系的动态就包括朋友们相互影响彼此的价值观，从而以一种建立重要亲密关系的方式分享这种价值观。

弗里德曼的观点部分在于，以构成友谊亲密感的方式分享评价视角，意味着将她的价值观纳入我自己的价值观之中。怀廷 (1991) 认为，这种方法无法正确理解“我爱我的朋友是因为*她*”这一概念。因为要求我朋友的价值观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模糊了为了她而珍视这些事物和为了我自己而珍视这些事物之间的区别。此外，怀廷 (1986) 认为，将我为了她而对她的关心理解为为了我自己而对事物的关心，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后一种关心。然而，怀廷认为，后者至少与前者一样不明确，这一点在我们思考长远以及我与“未来的自我”的联系和责任时就会显现出来。她声称，解决办法是理解我的目的（或你的目的）的价值与它们是否是我的（或你的）这一事实无关：这些目的本质上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应该关心它们，无论它们是谁的目的。因此，我必须为了我自己而关心自己（包括我未来的自己）的原因与*我必须为了我的朋友而关心她的*原因是一样的 ：因为我认识到她或我所具有的（优秀）品格的内在价值（Whiting 1991, 10；类似观点见 Keller 2000）。因此，怀廷提倡她所谓的“非个人的”友谊概念：有很多人可能表现出（我认为的）优秀品格， 只要他们都“同样值得我关心”，他们就是我的*非个人的朋友*；什么可以解释但不能证明我的“仅对*某些人*有差异且显然是个人的关心……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和心理偶然事件的结果”？（1991，23）

需要明确的是，怀廷并非仅仅声称朋友之间价值观的共同点在于这些价值观恰好一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对友谊的理解就很容易受到指责，认为朋友之间并非真正关心彼此，而仅仅关心彼此所体现的内在价值。怀廷认为，我之所以关心朋友，部分原因在于我致力于提醒她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培养她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以防止她误入歧途。我的这种承诺显然也是对她的承诺，而一段以双方都具备这种承诺为特征的关系，能够持续且非偶然地强化彼此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

布林克（1999）批评惠廷对友谊的阐释过于客观，因为它未能理解友谊关系本身的内在价值。（类似批评意见，参见杰斯克，1997。）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与弗里德曼（1989）对任何以朋友属性评估为基础的友谊概念的批评相同（参见 上文[1.1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ti)第3段 ）：这种友谊概念将我们对朋友的关注置于对价值观的关注之上，从而忽视了友谊成为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的本质。鉴于惠廷对朋友之间共享价值观的理解，即他们诉诸于这些价值观的内在和非个人价值，她似乎无法理解上文对弗里德曼的反驳：我可以将对某些价值观的关注置于对朋友的关注之上，从而部分出于对朋友的关注而改变我的价值观。然而，布林克的批评更为深刻：

除非我们对爱情和友谊的描述赋予朋友之间历史关系的内在意义，否则似乎无法证明我们对朋友*本身的*关心是合理的。[1999, 270]

布林克认为，只有从历史关系的意义来看，我们才能理解友谊的理由，以及友谊所要求的关注和活动是与施事者相关的（因此也是个人的），而不是与施事者中立的（或非个人的，如怀廷所说）。[ [5](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5) ]

Cocking & Kennett (1998) 的理论或许是对 Rorty (1986/1993) 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对亲密友谊的解释部分在于，朋友在改变彼此的评价视角方面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他们认为，在友谊中，我们“乐于接受”朋友的“指导”和“解读”，从而改变我们的兴趣。被 朋友*引导*，就是让她的兴趣、价值观等塑造你自己；因此，你的朋友可能会建议你们一起去看歌剧，而你也可能会同意，即使你之前对歌剧毫无兴趣。通过他的兴趣、热情和建议（“你不是很喜欢第三幕结尾的二重唱吗？”），你可能会直接被他感动，仅仅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就对歌剧产生了兴趣。被 朋友*解读*，就是让你对自己的理解，尤其是对自己优缺点的理解，受到朋友对你的解读的影响。因此，你的朋友可能会钦佩你的坚韧（你从未意识到自己拥有的特质），或者对你过度追求公平感到好笑，而你可能会因此对自己产生新的认识，并可能直接改变自己，以回应他对你的解读。因此，Cocking & Kennett 认为：“我朋友眼中的自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友谊的产物”（505）。（Nehamas 2010 也对朋友的解读在塑造一个人身份方面的重要性进行了类似的阐述，尽管 Nehamas 强调，你对朋友的解读可以揭示出一些有价值的潜在存在方式，而这些方式是你自己“事先从未想象过的”（287）。）

在朋友如此引导和解读的过程中，你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一点有点模糊。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引导和解读吗？Cocking & Kennett 将友谊理解为一种 接受朋友吸引的*接受性*，并且他们显然将这种接受性理解为性格特质，这暗示了这一点。然而，这似乎意味着你将自主权拱手让给了朋友，而这肯定不是他们的本意。相反，我们似乎至少会选择性地接受朋友引导和解读的方式，并且我们可以抵制其他的引导和解读。然而，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接受任何这样的引导和解读。一个答案可能是，我们承认朋友利益的独立价值，或者我们承认他们对我们的解读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解释友谊在这种引导和解读中的作用，因为我们也可能很容易地接受来自导师甚至陌生人的引导和解读。这一缺陷或许会促使我们以规范而非性格来理解我们对指示和诠释的接受能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接受朋友的指示和诠释，正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这或许会促使我们形成更深刻的亲密关系和价值观共享的概念，从而理解友谊为何构成这些规范的基础。

这种更强烈的亲密概念体现在谢尔曼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朋友共同生活的论述的解读中（Sherman 1987；另见 Moore & Frederick 2017，他们认为朋友必须共同生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以共同叙述的形式相互认可共同的活动，并将这些活动解读为有意义的。根据谢尔曼的亚里士多德理论，友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朋友们彼此认同，表现出“心灵合一”。首先，这包括一种同情，即我对朋友的感受与他相同。与类似的论述不同，谢尔曼明确地将骄傲和羞耻列为我对朋友的同情——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因为骄傲和羞耻在构成我们的自我意识甚至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作用（Taylor 1985）。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谢尔曼声称，我们因这种富有同情心的自豪感和羞耻感而获得“归属感和依恋感”，从而“认同并分享他们（我们的朋友）的好处”（600）。[ [6](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6) ]

其次，更重要的是，谢尔曼笔下的亚里士多德理解朋友之间在共同思考过程中所拥有的思想上的单一性。因此，正如她总结亚里士多德（1170b11-12）的一段话：

性格朋友生活在一起，不是像动物那样分享同一片牧场，而是“分享争论和思想”。[598]

关键在于，朋友们“共享”的价值观，不仅仅体现在彼此的价值观之间存在显著的重叠，也不仅仅体现在朋友之间相互影响的维系。更确切地说，这些价值观的共享，本质上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是他们通过共同商议而达成的。

*朋友们对幸福*（即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 有着共同的理解 。通过就具体实际问题做出共同决定，朋友们开始表达这种共同的承诺……由此产生的任何快乐或失望都属于双方，因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共同的，因此责任也由双方共同承担。[598]

这种解释的目的并非准确描述特定的友谊，而是提供一种理想，而实际的友谊至多只能近似于这种理想。这种强烈的分享观念让人联想到（主要是情色）爱情的结合观，根据这种观点，爱情在于形成某种重要的结合，即“我们”（参见关于爱情的词条， 关于[爱情作为结合](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ve/index.html" \l "LoveUnio)的部分 ）。与[爱情](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ve/)的结合观一样，这种对友谊的解释引发了人们对自主性的担忧。因此，谢尔曼的亚里士多德似乎消除了两个朋友之间的利益甚至能动性之间的任何明确区分，从而破坏了自主性的那种独立性和自我发展的自由。如果自主性是个人善的一部分，那么谢尔曼的亚里士多德可能不得不得出结论，友谊在某种程度上是坏的；因此，结论可能是，我们应该拒绝这种对友谊亲密性的强烈观念。

从谢尔曼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来看，我们无法明确是否有原则性的理由来限制我们与朋友分享身份的程度；或许，类似弗里德曼的联邦模型（1998）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难题。弗里德曼的观点是，我们理解浪漫爱情（但这一理念也适用于友谊）的方式不应局限于两个人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他们的身份会被这种结合所包容；而应理解为个体的联邦——即创建一个第三方实体，该实体预设了构成它的个体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即便如此，要令人满意地阐明这一观点，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有关弗里德曼的更多论述，请参阅 [“爱”条目中](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ve/)[“爱作为结合”](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ve/index.html" \l "LoveUnio)的部分 。）

在所有这些关于友谊所特有的亲密关系和承诺的论述中，我们或许会思考，在何种条件下友谊才能被恰当地解除。因此，只要友谊包含某种承诺，我们就不能无缘无故地放弃朋友；我们的承诺似乎也不应该无条件地、无论发生什么都对我们具有约束力。更清楚地理解何时应该终止友谊，或允许其失效，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友谊所特有的承诺和亲密关系；然而，这个问题在文献中却鲜有关注。

### 1.3 共享活动

友谊的哲学阐释中最后一个共同点是共同活动。其背后的直觉是：即使你们彼此关心对方，却从未与他人共同活动，这种互动就无法称之为友谊。相反，朋友们会进行共同的追求*，*其部分动机是友谊本身。这些共同追求不仅包括一起制作东西、一起玩耍和交谈，还包括本质上包含共同经历的活动，例如一起去看歌剧。然而，要使这些追求在“分享”的意义上得到恰当的*分享*，它们不能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例如，如果你以后帮我粉刷房子，我今天就帮你建篱笆。相反，这种活动必须部分是为了与我的朋友一起进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活动必须至少部分地受到友谊本身的激励。

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这种活动可以说是“共享的”？友谊的哪些方面使得共享活动如此重要？第二个问题的常见答案（有助于确定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共享活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朋友之间通常有共同的兴趣，而这种共同的兴趣是友谊特有的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对这种共同兴趣的“共同”追求是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特定理论对共享活动的解释，至少应该部分取决于该理论对与友谊相关的亲密关系类型的理解。总体而言，情况似乎确实如此：例如，托马斯 (Thomas, 1987, 1989, 1993, 2013) 认为亲密关系在相互自我表露方面具有较弱的概念，在他的友谊论述中，共同活动的地位很低；而谢尔曼 (Sherman, 1987) 则认为亲密关系在共同的价值观、深思熟虑和思想方面具有较强的概念，他不仅在友谊中将孤立的共同活动置于中心位置，更重要的是，在友谊中将共同的生活置于中心位置。

尽管如此，在关于友谊的文献中，共享或联合活动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人们并没有太多思考去清楚地阐明朋友们共享活动的意义。这令人惊讶且遗憾，尤其是因为对此类活动“共享”意义的理解与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密切相关，而亲密关系是任何关于友谊的解释的核心；事实上，对友谊所特有的共享活动类型的清晰解释反过来可以揭示它所涉及的亲密关系类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某种特定的友谊理论可能会受到批评，因为它对友谊亲密性的解释无法很好地解释共享活动的意义。例如，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必须区分我们一起从事的活动（部分是出于对我所爱之人的关心）和我们共享的活动*（*至少部分是为了共享而从事）；有人可能会认为，只有后者才是构成*友谊*关系的共同活动，而不是仅仅构成我对他的关心（参见诺齐克，1989）。因此，根据这种思路，任何关于友谊亲密性的解释，如果不能理解利益共享，从而理解这种区别，就应该被拒绝。

Helm (2008) 至少部分地从理解友谊的角度阐述了共同活动和共同价值观。他认为，朋友之间共同活动的意义并非社会哲学中关于共同意图的文献中所讨论的那种共同意图和多元主体性（关于这一点，参见 Tuomela 1995、2007；Gilbert 1996、2000、2006；Searle 1990；以及 Bratman 1999），因为这种意图的共享并不涉及友谊所必需的亲密性。相反，友谊的亲密性应该部分地理解为朋友之间构成了一个“多元主体”：一群拥有共同关怀——共同评价视角——的人。他主要从人际关系中联系的情绪、欲望、判断和（共同）行动的模式来分析这种视角。赫尔姆声称，当朋友之间形成一个积极关心彼此关系的多元主体时，友谊便产生了，而友谊的多种类型，包括快乐友谊、功利友谊和美德友谊，应该根据他们共同理解彼此关系的特定方式来理解，即他们以某种方式将彼此的关系视为他们所关心的事物——例如网球伙伴或生活伴侣。

## 2.友谊的价值与理由

友谊在我们的生活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各种关于友谊的论述都旨在明确和阐明这一角色。因此，我们不仅要理解友谊的价值所在，更要理解特定友谊的意义所在。

### 2.1 个体价值

理解友谊价值的一种方式是，个人在思考是否要（或继续）维持一段友谊时：为什么我要在朋友身上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而不是在自己身上？是什么让我觉得友谊有价值？那么，我应该如何评价我拥有的友谊是否是好的友谊？

一种答案是，友谊本身就是一种益处。因此，特尔弗（1970-71）认为友谊能够“*提升生活品质*”，因为它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它通过强化我们对活动的专注，从而提升我们从中获得的乐趣，来提升我们的活动（239-40）。此外，她还认为，友谊本身就令人愉悦，对朋友也大有裨益。安妮丝（1987）补充说，友谊有助于提升自尊，这既是工具性益处，也是其本身的益处。

然而，友谊并非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正如安尼斯所言：“如果友谊普遍消亡，我们的生活将大大逊色”（1987, 351）。库珀（1977b）在解读亚里士多德时，提出了两个论证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库珀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得好需要一个人了解自身生活的美好；然而，鉴于自欺欺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一个人只有通过友谊才能准确地评价自己的生活，在友谊中，朋友就像一面镜子，照耀着一个人。因此，只有通过友谊提供的认知途径，才能拥有蓬勃发展的人生。其次，库珀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友谊所特有的那种共同活动，对于一个人能够“持续地”和“愉快而感兴趣地”参与到美好生活所特有的活动至关重要（310）。这些活动包括道德和智力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往往难以保持兴趣而不被诱惑去做其他事情。友谊，以及它本质上包含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活动，对于加强我们对这些活动的理性和实践理解至关重要，即使它们充满困难，而且我们追求它们的兴趣也随时可能消退，但它们仍然是有价值的。因此，库珀总结道，友谊的共同活动是人类繁荣的部分构成。同样，比斯（2019）沿着康德的思路论证，友谊以及友谊所包含的那种信任，是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核心和必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都试图从友谊如何以工具性或构成性的方式对个体有价值的其他事物做出贡献的角度来理解友谊对个体的价值。然而，人们也可能认为友谊本身就很有价值。舒曼（1985）部分是为了回应其他关于友谊价值的论述中的个人主义，他声称在友谊中，朋友们“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存在和价值的独特共同体”（280）：友谊的亲密性导致了“一种基于与他人结合而存在和行动的方式”（281）。尽管这一论断具有直观的吸引力，但舒曼并没有清楚地解释这个“独特共同体”的价值是什么，或者它为什么应该具有这种价值。事实上，我们应该预期，充实这一论断将涉及一个关于该共同体的性质以及它如何能够拥有独立（或联合？——参见弗里德曼 1998）的存在和价值的实质性提案。再次强调，关于共同意向和多元主体性的文献与此相关；例如，请参阅 Gilbert 1989、1996、2000；Tuomela 1984、1995；Searle 1990；以及 Bratman 1999。

与友谊价值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与这个人做朋友，而不是与其他人或根本不做朋友，这有什么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友谊价值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以解答友谊的正当性问题。毕竟，如果友谊的价值总体上在于它如何（无论是工具性还是构成性）为我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那么我似乎可以根据友谊对我生活发展的贡献程度来判断它是否正当。然而，这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暗示了——这肯定是错误的——朋友是 可以替代的。 （可替代性是指可以被一个类似的对象替换*，*且价值不会有任何损失。）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朋友具备某些属性（可能包括关系属性），而我有理由与她成为朋友（因为正是凭借这些属性，她才为我的成功做出了贡献），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样有理由与任何拥有类似属性的人成为朋友，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将我现在的朋友替换成另一个这样的人。事实上，甚至当我现在的朋友以外的人比我的朋友更能展现出相关的友谊属性时，我或许应该“升级”。这种对友谊的理解无疑是令人反感的。

在解决这一可替代性问题时，哲学家们通常关注友谊的历史关系特征（参见上文引用的Brink 1999）。Sherman在1987年提出的关于友谊的“联合”论述或许可以找到一种方法（Schoeman 1985年关于友谊价值的论述或许也暗示了这种观点）。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而结成某种联合，而这种生活方式是通过我们特定的互动和生活分享历史而形成和维持的，并且如果我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感因此取决于这些价值观和身份认同，那么，用另一个人取代我的朋友而不造成任何损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人不可能拥有我朋友的*相关*属性，即她与我的历史关系。然而，这种解决可替代性问题的方案（它既适用于友谊，也适用于爱情）的代价是上文1.2节结尾处提出的对自主性的担忧。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将我朋友的这些历史关系属性理解为我们友谊的正当性更直接地关联起来。因此，Whiting (1991) 将我们建立友谊的理由（她认为这些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个人化的，允许可替代性）与我们维持友谊的理由区分开来；她认为，后者可以从我们彼此关心的历史中找到。然而，除了思考友谊的普遍价值所提供的理由之外，历史关系属性如何为友谊提供任何其他理由尚不清楚，因为思考友谊的普遍价值并不能解决可替代性问题。仅仅“这是我的朋友”这一事实似乎并不能*证明*我继续保持友谊是合理的：当我们想象我的朋友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以至于他失去了那些证明我与他最初友谊的美德时，我为什么不应该甩了他，去找一个拥有这些美德的人建立新的友谊呢？诉诸我朋友或我们友谊的历史属性如何能够提供答案尚不清楚。

这里的问题部分源于人们对正当性本质的默认先入之见。如果我们试图以朋友是与我有着特定历史关系的特定个体来证明友谊的持续性，那么我们似乎只是诉诸于一些特质和主观属性，这些属性或许可以解释友谊，但无法证明友谊的正当性。这似乎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正当性需要诉诸朋友是某种*类型*的人，拥有其他人可能共有的普遍客观属性；这导致了可替代性问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似乎需要以某种方式克服这种关于正当性的先入之见——而这项任务在关于友谊的文献中尚无人尝试过。

（有关爱情背景下出现的可替代性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以及有关爱情的对象（而不是理由）是特定的人还是一类人的相关问题的讨论，请参阅 [爱情](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ve/)条目的第 6 节。）

### 2.2 社会价值

另一种解读友谊价值的方式是从更社会的角度来理解：让社会成员建立友谊关系对社会有什么好处？特尔弗（1970-71，238）回答说，友谊“通过为他人的福祉提供某种程度和类型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在友谊之外是无法存在的”，从而促进了普遍福祉。布鲁姆（1980）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友谊是道德卓越的重要源泉，正是因为它本质上意味着为了朋友而行动，而这种行动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道德价值。（类似观点，参见安尼斯，1987。）

Cocking & Kennett (2000) 反对这种认为友好行为*本身*具有道德善意的观点，他们声称“我或许是一个完美的朋友，但我可能并非一个道德完美的朋友”（287）。他们基于友谊的概念，认为友谊涉及被朋友引导和解读，并声称“我被你对赌场赌博的兴趣所引导的可能性，与被你对芭蕾的兴趣所引导的可能性一样大”（286）。然而，Cocking & Kennett 似乎对他们所接受的（参见 284）这一观点——朋友之间关心彼此的福祉——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因为，如果我关心你的福祉，并发现你即将采取不道德的行动，我不应该像 Cocking & Kennett 所建议的那样，盲目地让你拉拢我加入你；相反，我应该试图阻止你，或者至少让你质疑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引导和解读了你。在此背景下，Koltonski（2016）认为，一个人应该确保他的朋友正确地进行道德审议，但随后要听从朋友的判断，即使他不同意道德结论，因为这种尊重是对朋友的道德主体地位的适当尊重。

这些关于友谊社会价值的答案似乎同样适用于爱情：只要爱情本质上既包含为了爱人而对他的关心，又因此为了他而采取行动，爱情就会展现出同样的社会价值。然而，弗里德曼（1989）认为，友谊本身具有爱情所不具备的社会价值。弗里德曼从价值观共享的角度理解友谊的亲密性，他指出，友谊可以包含相互支持，尤其是对非传统价值观的支持，这可以成为促进社群道德进步的重要动力。因为“实际上，我们对特定人的承诺，与我们对抽象道德准则的承诺形成必要的*平衡*，有时甚至可能优先于后者”（6）。因此，友谊制度不仅对个人有价值，对整个社群也同样有价值。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会担心友谊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正如托马斯 (1999) 和林托特 (2015) 所说，在爱情和友谊中，我们倾向于对“像我们这样的人”给予特权，这可能会导致对种族、阶级和性取向等某些社会身份的偏见，从而加剧这些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强化认知不公正，并限制我们的道德发展。

## 3.友谊与道德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质疑友谊现象与特定道德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许多人（Stocker 1976, 1981；Blum 1980, 1993；Wilcox 1987；Friedman 1989, 1993；Badhwar 1991；Cocking & Oakley 1995）批评了结果主义和义务论的道德理论，理由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友谊以及友谊所提供的理由和动机不相容。通常，诉诸友谊是为了回避主要道德理论类型（结果主义、义务论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传统争论，因此“友谊批判”似乎尤为重要和有趣。[ [7](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7) ]

这些关于友谊与道德关系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友谊包含着 *特殊的责任*：特定人群基于友谊关系而产生的责任。因此，我们帮助和支持朋友的义务似乎远远超出了我们帮助陌生人的义务，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就像我们父母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孩子而承担着帮助和支持他们的特殊责任一样。事实上，安尼斯（1987）认为，这些责任“构成了友谊关系”（352；但参见伯恩斯坦（2007）关于友谊不涉及任何偏袒要求的论证）。鉴于此，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友谊的这些特殊责任与其他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对朋友的义务有时是否可以凌驾于我们的道德责任之上，或者我们必须始终将个人关系置于道德之下，才能做到恰如其分的公正（正如人们可能认为道德所要求的那样）？

斯托克（Stocker，1976）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个担忧：友谊现象揭示了结果主义和义务论的道德理论，它们认为无论动机如何，什么行为都是正确的，从而助长了一种“*道德分裂症*”：道德理性与动机之间的分裂。斯托克认为，这种道德分裂症总体上阻碍了我们协调道德理性与动机，并以一种摧毁我们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友谊的可能性的方式。鉴于友谊在我们生活中的显著价值，这显然是这些道德理论的一个严重问题。

友谊的哪些方面导致了这些问题？一个担忧源于结果主义中隐含的*行动的目的论概念*，根据这一概念，行动应根据其目的或意图来理解。问题在于，斯托克（1981）认为，友谊的典型行为不能以这种方式理解。成为朋友至少有时是出于对朋友本人的关心而采取行动（参见 [第1.1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ti)）。虽然*出于*友谊而采取的行动可能有目的，但这些行动被称为“友好行为”（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们），并非因为它们是为了任何特定目的而采取的：

如果出于友谊的行为由目的、有目的的倾向等等构成，而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目的，因此并非“出于友谊”这一短语所描述，那么似乎……无法保证一个人关心、喜欢、甚至对“朋友”怀有友谊。[Stocker 1981, 756–57]

也就是说，出于友谊的行为本质上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关怀——对特定人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朋友的既定回应习惯。斯托克总结道，这种行为动机是目的论行为观所无法容忍的，会导致道德分裂。（杰斯克（2008）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结论：为了弥合公正的道德义务与友谊的部分义务之间明显的分裂，我们必须放弃道德义务和非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别。）

斯托克（Stocker，1976）提出了另一种更为普遍的担忧，即源于友谊概念的结果主义和义务论。因此，尽管*行为结果主义者*——那些通过诉诸行为后果的善意来为特定行为辩护的人，这些善意是非个人化的（参见 [“结果主义](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nsequentialism/)”条目）——能够为友好行为辩护，但他们“无法将自身理性融入动机”（1976，70），因为出于最大化善意的目的论动机并非出于友谊。因此，行为结果主义者要么必须表现出道德分裂症，要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将行为的结果主义理由理解为我们的动机。然而，由于这些结果主义理由是非个人化的，采取后一种策略将会忽略友谊的核心理由和动机，从而破坏友谊制度本身。 （参见[第 2.1 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IndiValu)中关于友谊的非个人化论证和可替代性问题的讨论 。）

斯托克认为，*规则结果主义* （认为如果行为遵循导致整体上最善的原则或规则，那么行为就是正确的，这种观点是客观的——参见 [规则结果主义](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nsequentialism-rule/)条目）和*义务论*（认为行为只有符合对所有道德主体都具有约束力的某些规则或原则才是正确的）也是如此。因为即使规则结果主义和义务论可以为友好行为提供道德理由，例如，一个人必须造福朋友，但这些理由也是客观的，不会对我们的特定朋友给予任何特殊考虑。如果我们要避免道德分裂症，并将这一理由体现在我们的行动动机中，那么我们就不能出于友谊——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而采取行动。这意味着，任何避免道德分裂症的规则后果论者或义务论者都可以采取行动以造福她的朋友，但这种行为仅仅是假装*友好*，而非真正的友好，因此她无法拥有和维持真正的友谊。唯一的选择是将她的道德理由与友好行为的动机分裂开来，从而患上精神分裂症。（关于这种道德分裂症是否真的像斯托克认为的那样糟糕，请参阅Woodcock 2010。关于与斯托克类似的关于公正的道德理论以及基于友谊等人际关系的行动动机的担忧，请参阅Williams 1981。）

Blum (1980)（部分内容在 Blum 1993 中略作修改后重印）和 Friedman (1993) 抓住了结果主义和义务论的公正性与友谊固有偏袒之间的对比，更直接地主张拒绝此类道德理论。结果主义者和义务论者必然认为，像友谊这样的关系本质上涉及对朋友的一种特殊关心，因此这种关系要求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出对朋友的某种偏袒。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公正主义的道德理论必然认为友谊本质上是有偏见的，因此并非本质上是道德的。相反，此类道德理论只能声称，要“以完全道德上恰当的方式”关心他人，就需要“仅仅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关心，即，不考虑与他之间的任何特殊联系或依恋” (Blum 1993, 206)。布鲁姆和弗里德曼否认的正是这种说法：尽管这种普遍主义的关怀在道德理论中无疑占有一席之地，但友谊的价值——实际上是道德价值（参见 [2.2节](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 \l "SociValu)）——除非体现为对他人的关怀，即对他作为个体的关怀，否则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因此，他们认为，只要结果主义和义务论无法承认友谊的道德价值，它们就不能成为充分的道德理论，应该被摒弃，而选择其他理论。

作为回应，雷尔顿（Railton，1984）区分了主观结果主义和客观结果主义，认为斯托克和布鲁姆（以及弗里德曼）的这种“友谊批判”仅在针对主观结果主义时有效。（有关此论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阅梅森（Mason，1998）；有关另一种回应，请参阅萨德勒（Sadler，2006）。）*主观结果主义*认为，每当我们面临行动选择时，我们既应该在道德上证明特定行动的正当性，又应该受到相关结果主义原则的激励，从而直接采取行动（无论该原则评估的是特定行动还是行动规则）。也就是说，在采取应有行动时，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应该源于这些道德理由：因为这种行动促进了最大善（或符合倾向于促进最大善的规则）。显然，斯托克、布鲁姆和弗里德曼认为主观结果主义无法恰当地容纳友谊的动机是正确的。

相比之下，雷尔顿认为，*客观结果主义* 否认事态的客观正当性（就其后果而言）与行为主体行为动机之间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特定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是一回事（并且要从结果主义的角度进行），但该行为的动机可能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客观结果主义者可以恰当地承认，有时最佳事态不仅源于采取某些行为，还源于怀着某些动机（包括本质上是个人的动机）采取这些行为。雷尔顿尤其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出于对朋友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关切而采取行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因此，基于结果主义的立场，*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理由去培养这种友善的倾向，并且当这种倾向被激发时，我们就会出于对朋友的关切而采取行动，而不是出于对更大利益的非个人化、公正的关切。[ [8](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8) ] 此外，我们行动的道德理由与动机之间并无二致，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友善行为），这些理由可能要求我们在行动时出于适当的动机。因此，斯托克、布鲁姆和弗里德曼对友谊的批判是失败的。[ [9](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iendship/notes.html" \l "note-9) ]

巴德瓦尔（1991）认为，即使是雷尔顿更为精妙的结果主义，最终也未能将友谊现象纳入考量，道德分裂症依然存在。她认为，一个精妙的结果主义者必须既为了朋友而珍视朋友（才能算得上是朋友），又只有在这样做符合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才珍视朋友（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结果主义者）。

然而，作为一个非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并非自欺欺人的结果主义朋友，她必须将这两种想法结合起来。而这两种想法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为了保持一致，她必须认为：“作为一个结果主义朋友，我长期以来对你抱有特殊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仅限于重视你能够促进整体利益的程度。”……换句话说，她的动机结构是工具性的，因此在逻辑上与结束友谊所需的逻辑结构不相容。[493]

巴德瓦尔在此暗指雷尔顿的一个案例，即无论你或你朋友的过错如何，根据结果主义，正确的行为是牺牲友谊以换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结果主义者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必须“参考外在的标准来评估（友谊的）内在善及其美德”——即参考从非个人视角所构想的整体善（496）。然而，巴德瓦尔认为，友谊的价值只有从个人视角才能理解，因此，友好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必须诉诸于一种本质上是个人的关系来评估，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是为了朋友而行动，而不是为了创造普遍的最大利益而对这种特定的个人关系漠不关心。因此，成熟的结果主义由于其非个人的本质，使我们忽视了特定友谊的价值以及它们为出于友谊而行动所提供的道德理由，而所有这些只有从个人视角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这样一来，复杂的结果主义就破坏了友谊本身的独特之处。问题再次在于结果主义理由与友谊动机之间的分裂：一种道德上的分裂。

此时，似乎结果主义者对这类批评的正确回应是拒绝接受友谊和友好行为的价值的道德辩护必须是个人的这一说法：结果主义者应该说，友谊的善和友好行为所促进的善是我们必须能够从非个人的角度理解的事物，否则它们就无法进入对行为正确性的正确道德辩护 *。*因为成熟的结果主义者同意出于友谊的动机必须是个人的，所以他们必须拒绝在这些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最终道德理由是你的动机的想法，从而拒绝了友谊批判中隐含的相对较弱的动机内在主义（关于弱动机内在主义，请参阅 [“道德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条目，特别是关于](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oral-cognitivism/)[动机内在主义和道德判断的行动指导特征的](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moral-cognitivism/index.html" \l "MotIntActGuiChaMorJud)部分 ）。事实上，这似乎正是雷尔顿阐述其 *客观*结果主义的策略：做一个好人就是以道德上正确的方式行事（由结果主义所证实），因此，总的来说，拥有倾向于产生正确行为的动机，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友谊），这些动机无需——实际上也无法——以结果主义为依据。（有关此策略的进一步阐述，以直接回应Badhwar 1991，参见Conee 2001和Card 2004；有关雷尔顿对Card所阐述的复杂结果主义的辩护，参见Tedesco 2006。）

这意味着，友谊批判中关于结果主义的争论，部分需要从动机的本质以及道德理由与动机之间的联系入手。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友谊的核心——相互关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成熟的结果主义者可能会试图从友好倾向（与结果主义理由无关的动机）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相互关爱，而友谊批判的支持者会认为，这种尝试缺乏对所关心的特定对象的足够关注，因为这种关爱无法由她本人来证明（动机基于个人原因）。

迄今为止，关于友谊与道德理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理性的本质上。类似的争论也聚焦于价值的本质。斯坎伦（1998）以友谊为论据，反驳了他所谓的结果主义预设的目的论价值观。目的论观点认为，事态具有内在价值，我们对这种价值的认知为我们提供了创造、维持和促进这些事态的理由。斯坎伦认为，友谊涉及各种理由——例如忠诚——并非目的论意义上的，因此友谊的价值不符合目的论的概念，也无法被结果主义正确识别。针对这一论点，赫尔卡（2006）指出，该论点*预设了* 一种友谊的价值观念（即我们应该尊重和弘扬的友谊），这与目的论的价值观相悖，因此也与目的论的友谊观念相悖。因此，辩论必须转向关于价值本质的更普遍的问题，而不能仅仅关注友谊。

如果我们要厘清友谊在道德中的地位，就必须转向更广泛的议题，这些结论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友谊批判失败了：它未能成功绕过结果论者、义务论者和美德论者之间的传统争论。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成功了：它迫使这些道德理论认真对待人际关系，并因此在此过程中完善和复杂化了它们的论述。

****什么是志愿精神？****

****★****

志愿精神是体现在志愿者、志愿服务行动之中的内在精神特质。在我国，志愿精神概括起来可以描述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志愿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社会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是中国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的核心。

****友爱****

“友爱”：是指志愿者应欣赏他人、与人为善、有爱无碍、平等尊重。友爱精神跨越国界、职业和贫富差距，是没有文化差异、没有民族之分、没有收入高低之分的平等之爱。友爱是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基于相互理解和信任，人们在相互支持和帮助下自然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是人类美好情感的集中体现。它让社会充满阳光般的温暖。友爱精神是志愿服务过程中平等尊重他人的重要依据，友爱精神要求志愿者不能表现出高高在上施舍的姿态，而要始终保持谦虚友好平等的服务态度，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传递温暖、提供帮助，使志愿服务真正成为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的现代公益行为。

志愿服务精神提倡志愿者欣赏他人、与人为善、有爱无碍、平等尊重，这便是友爱精神。志愿者之爱跨越了国界、职业和[贫富差距](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B%E5%AF%8C%E5%B7%AE%E8%B7%9D/2101236?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是没有[文化差异](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5%B7%AE%E5%BC%82/10411904?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没有民族之分，不论高低贵贱的平等之爱，它让社会充满阳光般的温暖。如[无国界医生](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5%9B%BD%E7%95%8C%E5%8C%BB%E7%94%9F/15516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他们不分种族、政治及[宗教信仰](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7%E6%95%99%E4%BF%A1%E4%BB%B0/101081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为受天灾、人祸及战火影响的[受害者](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7%E5%AE%B3%E8%80%85/22981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提供[人道援助](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9%81%93%E6%8F%B4%E5%8A%A9/92065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他们奉献的是超国界之爱。1999年10月15日，无国界医生组织因“一直坚持使灾难受害者享有获得迅速而有效的专业援助的权利”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5%92%8C%E5%B9%B3%E5%A5%96/2505073?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

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1%E6%97%8F%E5%85%B3%E7%B3%BB/27004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问题的一项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1065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91%E6%95%B0%E6%B0%91%E6%97%8F/1176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1%E6%97%8F%E5%88%86%E8%A3%82/34172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的行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是祖国统一的基础，因此，必须维护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B0%91%E6%97%8F%E4%B8%BB%E4%B9%89/1005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6%96%B9%E6%B0%91%E6%97%8F%E4%B8%BB%E4%B9%89/26118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既要认真落实民族政策，认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又要坚决反对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依法严厉打击和制裁分裂祖国的活动。 [1]

2025年3月5日，《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 [7]2025年将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形象，团结就是希望，团结就是胜利。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6%B0%91%E6%97%8F%E5%85%B3%E7%B3%BB/0?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靠的是各民族团结友爱。一个家庭不团结，可能亲人反目；一个民族不团结，可能是一盘散沙；一个国家不团结，可能会分崩离析。我国各民族在历经数千年的迁徙、贸易、婚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孕育了团结友爱的宝贵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F%E8%B4%AB%E7%A7%AF%E5%BC%B1/49239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人民饱受欺凌。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必然像[奥匈帝国](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5%8C%88%E5%B8%9D%E5%9B%BD/730396?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等[多民族国家](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6%B0%91%E6%97%8F%E5%9B%BD%E5%AE%B6/18500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一样，分裂为无数的[单一民族国家](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5%E4%B8%80%E6%B0%91%E6%97%8F%E5%9B%BD%E5%AE%B6/39763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统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在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过程中，不仅民族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得以空前的光大，而且中华民族从自在的联合走向自觉的联合，团结一致走上了通向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

中华民族繁荣富强，靠的是各民族团结友爱。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88%B6%E5%BA%A6/41699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的确立，开辟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新纪元，中华民族展现出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展现出无比的自信心、自豪感。60年来，各族人民高举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旗帜，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携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BB%BA%E8%AE%BE/545750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Users/ranziyu/Documents\\x/_blank)和改革开放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壮丽史诗。60年来，中华民族在前进过程中克服了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种种困难和考验，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和挑战，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民族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心同德、并肩战斗。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要靠各民族团结友爱。今天，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往开来、意气风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把各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只有56个民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携手并肩、团结奋斗，中华民族才能焕发出无比磅礴的伟大力量，民族复兴的伟业才会展现出宽广灿烂的光明前景。

**什么是慈善？**

       慈善，就是慈心和善举，是对人的一种同情心、爱心，以及帮助他人的美好行为。慈善既可以是救助弱势群体，也可以是增进他人福祉的其他善行，是一种广义的慈善。

       长期以来，人们对慈善的理解更多是同情和帮助弱势群体，而这些是狭义慈善的表现。

**什么是筹款？**

       筹款，通常是指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为达成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比如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帮助解决某类困境群体的需求，然后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募捐、定向募捐或申请资助等方式获得第三方无偿赠予财产的活动。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健全保障改善民生”部分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公益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推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永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慈善事业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必须充分激发全民的爱心、调动全社会的热情，使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发展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深入学习、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推动慈善事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更大更好作用。

****一、公益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公益慈善事业是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扶持下，由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组织与开展活动的、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个人或群体，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无私的支持与奉献的事业，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实现形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之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慈善事业是惠及社会大众的事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新时代新征程上，公益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惠及社会大众。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提升公益慈善治理水平，既是我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也是我们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永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十四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我国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其中失能、半失能、空巢老人占比不少，农村地区低收入老人养老环境亟须完善；因病致困群体仍值得高度关注，在政府筑牢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网的同时，也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慈善救助；自然灾害频仍，要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事业，提升慈善业治理水平任重道远。

　　助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和谐发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推动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我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小康梦想，在实现共同富裕上迈进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同时，实现共同富裕必将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动社会向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迈进，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要鼓励先富群体发挥兼济天下的精神，自觉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体现道德文化和互助精神。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为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奠定了殷实的物质基础。发展慈善事业，可以增加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的收入。以利他为导向的公益慈善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乐善好施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儒家之仁爱博施，墨家之兼爱非攻，道家之无为自然，乃至法家之强国富民，医家之悬壶济世，都建构了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表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包括慈善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精神发扬光大。

****二、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益慈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慈善事业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助力营造良好慈善社会氛围，使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

　　公益慈善组织、人员、活动、捐赠规模日益扩大。截至2024年6月，全国共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1.5万个，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3200多个。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29家，累计发布公开募捐信息17万多条，带动超过600亿人次的网民参与，累计募集善款500多亿元。把每年9月5日设为“中华慈善日”，通过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举办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等活动，大力传播慈善理念，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加大慈善法宣传力度，政府依法监督管理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慈善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和监督慈善事业的观念基本建立起来。脱贫攻坚期间，全国慈善组织每年用于扶贫济困的支出超过500亿元，有力支持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等慈善活动参与者，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医助学、生态保护、灾害救助等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益慈善事业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法律形式对慈善活动进行全面规范，有力促进慈善事业蓬勃发展。今年9月5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慈善法的修改，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为推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慈善法颁布后，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情况，民政部门及时推动制定配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法律有效实施。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截至目前，国家和地方共出台有关法规、政策文件400多份，涉及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公开募捐、慈善信托、慈善活动支出、信息公开和财产保值增值等多方面。慈善领域法律规范体系基本建立，慈善工作实现有法可依。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坚持鼓励支持和监督管理并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更加有序。慈善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导督促慈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健全法人治理机制，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严守公益初心和非营利性底线，防范公益慈善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规范慈善活动，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持续推进依法治善、依法促善、依法行善。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国慈善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慈善事业的扶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工作，慈善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对其进行指导、监督。民政部门启动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等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持续开展慈善组织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报送工作、抽查审计工作，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鼓励社会监督，加强行业自律，慈善事业公信力和透明度显著提升。

****三、努力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慈善组织有序发展，慈善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应看到，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我国慈善事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进一步优化慈善事业发展环境，规范慈善活动，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努力推动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慈善表彰制度。精神褒奖对营造人心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氛围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逐步建立多层级、多元化的社会褒奖机制。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对行善者提出表扬，大力宣传他们的贡献；另一方面，还要允许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及受益方对捐赠方、助人者给予精神褒奖。全面优化慈善事业扶持政策，明确国家建立健全慈善事业税收优惠制度，激发全社会关心慈善、参与慈善的热情。大力宣传公益慈善工作的好人好事，加强公民慈善理念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结合“八五”普法规划，充分利用“中华慈善日”等契机，发挥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的作用，开展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的慈善实践活动和法律宣传。加强慈善教育和慈善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理性参与、大力弘扬慈善事业。

　　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支持更多人财物投入社会公益领域。发展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声望、较强专业能力、完善治理结构的现代慈善组织，发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的骨干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的主体。目前，企业捐赠占款物捐赠总量的60%以上。要鼓励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增加慈善捐赠。要积极有序发展慈善组织，动员更多社会组织从自身实际出发参与慈善捐赠。要增强个人公益慈善意识，采取财物捐赠、志愿服务、互助互济等多种方式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目前，我国个人捐赠占捐赠总量比重不到30%，需要进一步提高，鼓励更多民众投入慈善事业中来。

　　探索公益慈善活动有效实现形式。要加强现代慈善组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非营利法人制度，打造慈善捐赠主平台。完善志愿者注册、服务记录、激励嘉许、保险保障、基层组织等制度，搭建好志愿者服务平台。要探究金融助力第三次分配的方式，鼓励设立慈善信托。利用数字网络便捷泛在的优势，积极培育和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要加大扶贫济困、教育、医疗卫生、助残助老、减灾救灾等方面慈善投入，拓展生态环保、文艺、科技等领域慈善活动，支持慈善力量更加及时充分参与重大突发事件救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在地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媒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帮助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应急慈善活动。